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 一五五〇年前的 中国基督教史

[英] 阿·克·穆尔 著 郝镇华 译

13979.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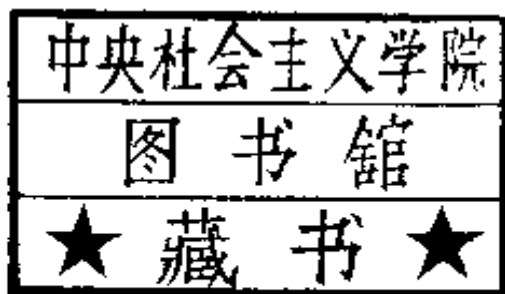
714-3/52

57558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 一五五〇年前的 中国基督教史

〔英〕阿·克·穆尔 著  
郝镇华译 蒋本良校



中 华 书 局

1984年·北京

责任编辑：谢 方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英] 阿·克·穆尔 著

郝镇华译 蒋本良校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12<sup>5</sup>/。印张·1插页·252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统一书号：31018·1277 定价：1.20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中译者序言

本书作者阿瑟·克里斯托芬·穆尔 (Arther Christopher Moule), 英国人, 生于 1873 年, 1955 年去世。

穆尔是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 基督教史学家。他最初是一位建筑师, 后来作为基督教传教士于 1898—1908 年在中国传教。1908 年回国, 在英国仍担任教职。1933 年以后, 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学。1933—1938 年, 任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及历史讲座教授。1940—1945 年, 任曼福德大学校长。

穆尔的主要著作有: 《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1930 年); 《马可波罗游记校注》(1938 年)(与伯希和合著)。

本书所述时代, 包括从唐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至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这一时期。本书所说基督教徒, 实指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和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传入中国的罗马天主教所属方济各会。

本书用大量史料, 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早期基督教九百年间的兴衰史。唐代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派, 此名初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碑文云: “真常之道, 妙而难名, 功用昭彰, 强称景教。”景教于公元五世纪产生于拜占庭, 其创始人为聂斯托里, 所以也称聂斯托里教。聂斯托里原为叙利亚神甫, 公元 428—431 年任君士坦丁堡总主教, 因其学说与当时流行的基督教义不相一致, 遂在公元 431 年以弗所会议上被谴责

为异端。聂斯托里被逐放，其教徒逃亡波斯，景教遂由波斯传播至中亚，并于唐贞观九年，由叙利亚人阿罗本传入中国。

唐太宗时，唐朝声威远震中亚，西域诸国相率来朝，长安一城，万国辐凑。波斯和阿拉伯诸国人或使节或商旅或僧侣，经西域进入中国。贞观九年，阿罗本首途长安，译经传教，迄高宗时，已是“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见当时景教之兴盛。高宗去世，武后执政，武则天信奉佛教，其他宗教受到歧视，景教自然也不例外，但仍流布未衰。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下诏灭法毁寺，此举也波及大秦(景教)、穆护、袄等教。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会昌灭法”。此后，景教徒多被勒令还俗或回归本籍，不愿回籍者则多改习中国学术和诗文，希望应举服官，或皈依其他宗教。自此，景教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景教在唐时流传二百一十年，而今可供考证者仅《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及敦煌鸣沙山千佛洞景教经文寥寥数卷。但在五代和北宋政权鞭长莫及的中国西北边陲，仍有景教流行，如蒙古的克烈部、乃蛮部和汪古部以及新疆的回鹘人等依然多奉景教。

基督教在元代称为也里可温，此名在赵州柏林禅寺圣旨碑所录元太宗五年(1233年)诏书中已有记载，元代史书中也屡见不鲜。

在元代，蒙古政权扩及欧亚两洲，中西交通大为畅通。原处西北边地多信奉景教的克烈部人、乃蛮部人和汪古部人以及畏兀儿人向内地迁徙，原居北高加索山麓信仰景教的亚速人(亚兰人)，也随蒙古军至中国。此外，西域诸国流寓中国者日益增多，中亚景教徒也东入中土。在元代，西域人入华初建景寺者为马薛里吉思(阔里吉思)。马薛里吉思来自薛迷思干

(撒马尔罕)，至元年间为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他在至元十六——十九年(1279—1282年)兴建景教寺六所，即镇江大兴国寺、云山寺和聚明山寺，丹徒县的四渎安寺和高安寺，后又在大兴国寺侧建甘泉寺；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休官后在杭州荐桥门又建大普兴寺。当时的景教寺称“忽木刺”。在元代，除景教外，尚传入罗马天主教。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来华传教，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抵汗八里(北京)，大德二年(1298年)在北京建立第一所天主教堂。教皇克列蒙特五世闻约翰在中国传教勋绩卓著，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特设汗八里总主教一席，由约翰充之。同年教皇为襄助约翰，复派主教哲拉德、裴莱格林、安德烈、尼古拉斯、安德鲁梯斯、赛福斯托德及威廉等七人携诏书来华。皇庆二年(1313年)，只有哲拉德、裴莱格林和安德烈三人到达汗八里。越五年，约翰派哲拉德赴刺桐(泉州)任主教。哲拉德去世，延祐五年(1318年)，裴莱格林继任刺桐(泉州)主教。至治三年(1323年)，裴莱格林去世，安德烈继任刺桐主教。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安德烈去世。据记载，基督教在元代领洗者有三万人，元廷为管理景教，还设立专官崇福司。但元代信奉基督教者，大抵皆为中国西北诸部人和西域来华诸国人。1368年元朝灭亡，这些人或远逃塞外或回原籍。此后奥托曼土耳其兴起，西域孔道为之堵塞。从此中国基督教也随之消失。越二百年，即迄158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中国的基督教才又重新出现。

作者在《前言》中声明，他拟将1550年以前有关中国基督教徒的中西文史料译成英文，收集成册。作者治学态度是比

较严谨的，如选择史料，主要以正史、手稿、碑铭和方志为准；在采用历史传说和游记时，总是寻求旁证；有多家之言和怀疑，必溯其流变，辨其真伪，决不陈陈相因。如作者在做了大量考证之后，否定了数百年来在西方基督教史书中广为流传的耶稣门徒圣多默(St. Thomas)来中国传教的故事；指出一些游记所载杭州有“一万二千座桥”乃是夸张之词。再如有些记载尚难证实真伪时，作者不加妄评，而作为一家之言保留之。但由于作者是传教士，本书是站在传教士的立场上编写的，在资料的编译和说明中也常带有宗教色彩，这方面也请读者留意。

作者编撰此书时，查阅了大量中文著作，其中重要史籍有：《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宋史》、《元史》、《元典章》、《元通制条格》等等。方志有：《开封府志》、《长安志》、《泉州府志》、《至顺镇江志》和《淳祐临安志》等等。佛经有：《大正新修大藏经》、《贞元释教目录》等等。这些中文著作，虽然提供了有关中国本土基督教活动的大量记载，但关于来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记述颇少。作者为了补充中文史料之不足，验证中文史料之记载，又查阅数十种西方重要文献。其中教会史著作有：《梵蒂冈手稿古著新编》、《传教会手稿集》、《基督教会早期传教史》、《方济各会史家集》以及弗朗多著《多明我会在日本和中国等国传教史》等等。此外还参考了多种游记，如《古代印度中国游记》、《阿布·泽德游记》、奈德托的《马可波罗游记》和拉缪肖的《航海与旅程》。在作者所引西方史料中，有更大价值的是下述原始材料：《梵蒂冈教廷档案手稿 I. Vii, 262》、《阿息西公共图书馆手稿 314》、《伦敦大英博物馆科顿手稿 Nero A. 9》、和《巴黎国家图书馆拉丁



文手稿 5006》等等。这些原始资料，保存了罗马教廷与元蒙皇室的来往国书以及西方驻华传教士的书信。

本书第四章《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拉班·扫马》是关于我国元代景教徒西行的重要记载。雅巴拉哈原名马可，与扫马同为元代畏兀儿人，皆景教徒。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二人出发西行去耶路撒冷朝圣。1281年，马可在波斯被选为景教法王，称马·雅巴拉哈三世。1287年扫马奉伊尔汗国国王阿鲁浑之命，出使欧洲，晋謁罗马教皇、法国国王和英国国王，敦促其出师，与东方联合，夹攻埃及。中西交通史上的这段重要史实，不见中文记载。此二位景教徒的传记，最初是波斯文，后不见流传，现尚保存叙利亚文译本，1888年在巴黎首次出版。1895年，夏博的法文译本《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拉班·扫马修士传》问世；1927年，蒙特戈麦利的英文译本《雅巴拉哈三世和扫马的历史》在纽约出版；翌年，布哲依叙利亚文本译为英文，题为《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两个僧侣》，伦敦出版；1932年，佐伯好郎依布哲的英文本译为日文，书名为《元主忽必烈派遣赴欧景教僧旅行志》。这一章是对元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补充。

我国在本世纪初，始发现唐、元时代景教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云：“太宗文皇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弛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据此可知，唐代景教必有中文译经流传，但究为何经，不得而知。清光绪末年，英国斯坦因至甘肃考古(1907—1908年)，于敦煌鸣沙山千佛

洞盗去古代写卷一批。1909年,法国伯希和又至,复盗去大量写卷,包括景教经文《三威蒙度赞》。宣统二年(1910年),清学部大臣命甘肃总督传令敦煌知事,将石室所藏残卷运往北京,在经手过程中,又有些景教经卷落入私人之手。从伯希和所获《三威蒙度赞》后所附《尊经》得知:“大秦本教经,都五百三十部。……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三十部卷。余大数具在贝皮夹,犹未翻译。”据此确知,至唐建中年间,至少已有三十部中文景教经在中国流传。迄今所见,国内外学术界已公布的敦煌石室唐代景教中文经典共八篇,作者在本书中只著录其中三种,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三威蒙度赞》和《尊经》,对《序听迷诗所(诃)经》只作了部分译述。译者为了全面反映本世纪以来在中国发现的景教文献,补充本书之不足,在本书译文之后特辟《附录》一节,收录了此书未收入的敦煌石室景教中文译经五篇:《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志玄安乐经》和《序听迷诗所(诃)经》。另外,收录了首次译为中文的两篇叙利亚文景教经文,即《新疆高昌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祈祷书断片》和《北京午门城楼上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译者在每篇附录之前,对其发现与收藏之经过作了简单说明。

本书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蒙张幼华、张文凯和陈书梅诸同志的热情帮助;译完后,蒙陆峻岭先生审阅,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又蒙蒋本良同志作了校阅,在此均致以诚挚的感谢。

郝镇华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1982年3月20日

# 目 录

中译者序言 .....	( 1 )
前言 .....	( 1 )
第一章 导论 .....	( 3 )
第二章 唐朝 .....	( 34 )
一、西安基督教碑 .....	( 34 )
二、敦煌景教《三威蒙度赞》 .....	( 59 )
三、敦煌发现的其他文献 .....	( 65 )
四、有关基督教徒和基督教的若干单独史料 .....	( 71 )
第三章 刺桐的十字架及其他遗物 .....	( 85 )
第四章 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拉班·扫马 .....	( 108 )
第五章 《马可波罗游记》摘录 .....	( 147 )
第六章 镇江府的基督教徒 .....	( 166 )
第七章 方济各会 .....	( 189 )
第八章 蒙古帝国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徒 ——根据东方史料 .....	( 245 )
第九章 十四世纪的西方作家： 一、波尔德诺内的鄂多立克 .....	( 271 )
二、《大汗国记》摘录 .....	( 280 )
三、《约翰·马黎诺里游记》摘录 .....	( 282 )

## 附 录

说明 .....	(297)
一、一神论 .....	(299)
1. 喻(谕)第二 .....	(298)
2. 一天论第一 .....	(301)
3. 世尊布施论第三 .....	(307)
二、序听迷诗所(诃)经 .....	(315)
三、宣元至本经 .....	(321)
四、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 .....	(324)
五、志玄安乐经 .....	(326)
六、新疆高昌发现的叙利亚文 景教祈祷书断片 .....	(332)
七、北京午门城楼上发现的叙利亚文 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 .....	(342)
重大事件年表 .....	(355)
索引 .....	(359)

## 插图目录

1. 公元 781 年西安景教碑上的十字架  
全图 ..... ( 33 )  
这张照片由塔姆斯先生摄自一拓本。
2. 崇仁寺平面图，位于西安西门外五里，西安景教碑  
1625—1907 年置于此 ..... ( 35 )  
此图原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  
1910 年。
3. 长安和西安。这张平面图大致表明了现代西安和古长安的关系、公元 638 年教堂的位置和景教碑的位置。这张图是根据《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一张很好的现代平面图和夏鸣雷的文章(载《汉学札记》第 12 册第 116、117 页)编制的 ..... ( 39 )
4. 西安景教碑标题铭文。这个标题是从一件拓本上摄下的，此图为全图的八分之一 ..... ( 41 )
5. 《唐景教碑抄本》的一页，是 1625 年 6 月在杭州刻印的。此页摄自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这页包括公元 638 年的皇帝诏书 ..... ( 44 )  
这张照片是卡塔拉兄弟摄的
6. 景教《三威蒙度赞》的中文原件，是八或九世纪的一份三页纸的手稿，1908 年伯希和教授发现于敦煌。感

谢伯希和教授，他借给我这张照片并允许我复制 ..... (60)

照片是庞斯先生摄的。

7. 《序听迷诗所(诃)经》最后二十行，这是在敦煌发现的一份手稿，现由高楠顺次郎博士保存 ..... (68)

8. 泉州第一个十字架。据说这是 1619 年在泉州附近的南安西南面的西山上掘出的十字架，1638 年被一些基督教徒发现 ..... (85)

这张照片是徐家汇图书馆员提供的，是从《唐景教碑颂正铨》(1644 年版) 的木刻版摄下的。

9. A. 泉州十字架。1638 年在泉州东门外一英里东湖岸发现的一个十字架

B. 1638 年在泉州城内水陆寺发现的一个十字架 ..... (86)

照片来源同上

10. 莫雅 1906 年在泉州发现的一个十字架；此照片由阿尔纳兹(P. G. Arnaiz) 摄，公布于《通报》(1914 年第 644 页) ..... (88)

《通报》编辑和发行者准许我复制。

11. 房山县十字架图。这两个十字架 1919 年发现于房山附近的十字寺。中央就是这个相当大的叙利亚铭文 ..... (98)

这张照片由塔姆斯先生摄自一拓本。

12. 十字徽章 ..... (106)

13. 中国元代景教徒拉班·扫马和马可西行纪叙利亚文本的一页(载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译者补)…………… (109)
14. 马可波罗手稿Z中叙述福州基督教界的一段话。这段话只见于最新发现的米兰手稿Z中。这份手稿的日期是“1795年7月8日”。现已证明,这是在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写于纸上的一份手稿的副本,当时的收藏者是哲拉达红衣主教,现在应藏托勒多牧师会图书馆,但未找到…………… (163)
- 这张照片是赛萨尔·帕金尼公司的,是阿姆斯特罗西亚图书馆馆长允许我复制的。
15. 大兴国寺碑文。这是1333年《至顺镇江志》(1842年版)第9卷第8、9页的一部分…………… (167)
- 照片是庞斯摄的。
16. 约翰·蒙特·科维诺第一封信的一部分,见巴黎手稿P(国家图书馆,拉丁文5006)…………… (198)
- 这张照片是国家图书馆友谊会提供的
17. 泉州城。《泉州府志》(1612年版)中所载泉州及其附近平面图,其中标志着方济各会教会和那里发现的十字架(本书图8、9)的可能位置…………… (219)
- 这张照片是弗列明公司摄的。
18. 《喻(谕)》第二手稿前十一行(原载佐伯好郎著“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160—161页,东京1951年版)
- 译者补…………… (299)

19. 《一天论》第一手稿前十一行(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174—175 页)——译者补 …………… (302)
20. 《世尊布施论》第三手稿前一部分(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206—207 页)——译者补 …………… (308)
21. 《宣元至本经》手稿后三十行(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312—313 页)——译者补 …………… (322)
22. 《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314—314 A)——译者补 …………… (325)
23. 新疆高昌景教叙利亚文祈祷书片断(原载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 1966 年版)  
——译者补 …………… (333)
24. 北京午门城楼叙利亚文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第一页  
(原载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  
——译者补 …………… (343)
25. 元代西方和中国著名旅行家行经路线图(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352—353 页)——译者补



## 前 言

中国在公元初期和中期已有基督教徒，本书拟将这方面能得到的证明史料收集成册，并将各种原著中的原文译成英文，尽量避免作任何概括、摘要或者表述个人意见。文中的重要参考书和必要的解释，均见脚注。但即使做到上述各点，本书仍不完备，因为有关证明古代中国存在基督教徒的史料已经积累很多，欲加整理非我的时间和精力所及；还因为篇幅所限，有时只能提供一个参考书目和摘要，以代替全文，这种情况特别见于第八章。

对许多朋友给我的热心帮助，我想都已在适当地方及时表示了感谢。已故的亨利·裕尔爵士和仍风华正茂的保罗·伯希和教授对我的赐教，几乎在每一页上皆可清晰见到。我从伯希和教授得到的友谊和鼓励对我的益处，我以为胜过他出版的书籍所提供的许多参考材料。我更感谢我的父亲以及已故的爱德华·沙畹教授、我的兄弟乔治和亨利；我还要感谢包括 G. K. 龙 (Leung)、S. 邹 (Zau) 二先生在内的其他许多人，并通过他们向素不相识的、对我有所帮助的中国人致谢。此外，我还要感谢大英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的职员们，感谢沃斯和克朗普顿先生，感谢为我提供插图的摄影师，特别感谢杭州的 R. F. 费奇博士，他允许我用他的美丽的灵隐寺照片作卷首插图。

我还要感谢《东罗马评论》的编辑 P. 塔奇·温图利牧师和其他杂志的出版者和编辑，他们慨然允许我使用他们各自刊物上发表的材料。东方读物出版社非常热情的借给我一些汉文铅字。最后对我的妻子表示谢意，她在校对清样和编写索引方面给我很大帮助。

本书可能使某些人失望，因为本书没有追述在这个国上上成长、发展和逐渐确立的某个基督教会的遥远起源，而只记述了不同时期和不同数量的、事实上或名义上的外国基督教徒在中国居住时的活动，虽然记述中将至少包括两个大的、可是令人失望的福音会的经历。本书也不打算探讨基督教对佛教和中国人思想可能有过的影响。已故的提摩太·理查德博士说，有一篇著名的佛经就是“亚洲式的我们救世主耶稣基督之福音书”；佐伯好郎教授说，“唐代中国实际上——虽说名义上不是——处于基督教影响之下”，可是迄今为止，没有公布出什么材料证明他们的说法。

对我来说，一致用威妥玛拼音法写汉字是容易的，但对亚洲的拼音文字进行直接译音就感到非常困难，在专家们看来也可能是错误的和不一致的，为此谨表歉意。我希望将来有一种统一的汉字拼写法能将由于删去中国字而造成的混乱减少到最低限度。有数条重要原文是复制的。

阿·克·穆尔

## 第一章 导论

利玛窦告诉我们，耶稣会士 16 世纪末进入中国时，他们发现，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真实记忆正在消失。利玛窦亲眼目睹了中国基督教史剧的最后一场，他对于这一场的记述，正可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引言。

有一位姓艾<sup>①</sup>的犹太人，他从《我的见闻》(Things I have heard tell) 这本中文书中知道了耶稣会士。1605 年 6 月末，他因事来到北京，趁机拜访了利玛窦，由此而相识。利玛窦写道：“我们从此人知道，河南省会开封有十至十二家犹太人，他们最近花费一万杜卡托(ducat)\* 修复一所非常美观的礼拜堂。在礼拜堂内，他们非常崇敬地收藏着写在羊皮纸上的《摩西五经》(Pentateuch of Moses)。他们居此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姓艾的人还说，在浙江省会杭州，信仰他们宗教的人家更多，那里也有一所礼拜堂。其他地方也有信仰他们宗教的，但没有礼拜堂，因为他们的信仰正在逐渐消失。由于他们不吃猪肉，中国人对于他们和萨拉森人(Saracens)几乎不加区分，尽管犹太人不喜欢萨拉森人的教，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sup>②</sup>

① 此人即艾田，祥符人，1573 年考中举人。参看《开封府志》第 23 卷第 48 页；伯希和：《犹太人艾》(Le Juif Ngai)，载《通报》1921 年

\* 从前欧洲许多国家通用的金币。——译者注。

第 38 页(译文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243—252 页。——译者注)。

- ② 《利玛窦神甫史编》第一卷《中国札记》(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I., Vol. I Commentari della Cina) 1911 年版第 469 页。在利玛窦的故乡马切腊塔利印的《利玛窦记事》(Ricci's Commentaries), 长期以来, 人们多少皆是通过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e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罗马 1615 年版)一书而知道的。

关于中国犹太人的历史, 人们知道得微乎其微。据中国存在的四、五通碑的记载, 开封礼拜堂建于公元 1163 年。这些碑分别立于 1489 年 6 月, 1512 年 8 月 3 日, 1663 年 6 月和 1679 年。最早一通碑文告诉我们, 七十家<sup>①</sup>犹太人宋朝时来到中国, 皇帝邀请他们定居汴梁(今开封)。另一通碑文说, 犹太人汉朝时来到中国。而第三通碑文(1663 年)将他们来中国时间更远溯到周朝或者公元前 250 年以前<sup>②</sup>。我们也从这些碑文知道, 这所礼拜堂在 1279、1421、1445、1461、1480 和 1512 年曾予以修复和扩建, 17 世纪中叶以后被重建。礼拜堂内收藏的摩西律法多达十三卷, 1642 年黄河决堤而被毁; 后来对此书碎片经过拼凑和誊写, 到 1663 年, 这十三卷律法又重新成书。这些古老版本中的两卷是十五世纪来自宁波, 这个事实似乎证明, 这个港口曾是一个非常兴旺的犹太人侨居地。碑上也有来自扬州和宁夏的捐助人的署名, 他们也可能是犹太人<sup>③</sup>。

(1) “七十”也许是“十七”之误。这块碑(即《弘治碑》——译者注)只记载十七姓。除李、艾二姓, 余皆接踵, 只有高、穆、赵、金四姓

尚可辨认，其余十一姓，从拓本上看十分模糊。托巴尔根据 1663 年碑，列举出李、赵、艾、张、高、金、石七姓。参看，托巴尔：《犹太铭文集》(Inscriptions Juives)1900 年版第 83 页。

这些铭文刻在三块石碑上。第一块碑上是 1489 年和 1512 年的铭文，第三块碑上是 1679 年的铭文（此铭文几乎无法辨认），这两块碑在 1912 年以前被移至开封加拿大圣公会 (Canadian Church Mission) 所在地，现仍谨慎保存。第二块碑上是 1663 年的铭文和大概同一时期的另一铭文，现已不知去向。

- ② 在中文书籍和碑文中，未发现关于宋代以前中国存在犹太人的记载。斯坦因在丹丹-乌利克发现一块犹太-波斯文残篇〔《古代于阗考》(Ancient Khotan)第 1 卷第 306—9 页, 570—4 页;第 2 卷,插图 cxix〕。1908 年,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用方形希伯来文字书写的一件 9 世纪或者 10 世纪的小手稿〔《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 1913 年 7—8 月号第 139—175 页〕。参看,伯希和的文章,载河内《法国远东学校校刊》(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第 1 期第 263、264 页;沙腕的文章,载《通报》1904 年第 482、483 页;劳弗的文章,载:《环球》(Globus)第 87 卷第 245—247 页。他们同意这个见解:犹太人大概是在宋代从印度经海路来中国的。
- ③ 这在《犹太铭文集》中到处可见。伦敦犹太人协会(London Jews Society)借给我一份从开封获得的犹太人手稿目录(不包括六大卷《摩西五经》)。其中二十九份(i—xxx 号中缺 xi 号)是祷告文,三十四份(xxxi—lxiv 号)是律法。所有这些手稿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有的部分也用其他文字:(a)许多标题和注释是用波斯文(希伯来或波斯字母)写的;(b)v 和 xii 号有波斯文译文,注在某些赞美歌上;(c)vi 号(安息日晨祷)的每周日期是用叙利亚文写的;(d)iv 号(安息日和其他节日的祈祷文)包括四十

多页的一份名单。名单中列有七姓(艾、李、张、高、赵、金、石),加杂用希伯来文、波斯文和中文书写,中文姓名有时也用希伯来字母拼写(如 לִישָׁה בָּן, 茶李)。妇女的姓氏似乎说明,与中国妇女结婚是普通事。参看,《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Review) 1895年10月第123—139页;《犹太教会会刊》(Jewish Miss. Intelligence) 1896年1月、10月;《犹太人通报》(Jewish Intelligence) 1851年第129—150, 432页。据了解,这些手稿现存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希伯来人联合会(Hebrew Union College)。

关于中国存在犹太人一事,阿布-泽德说,9世纪广府(即广州)侨民中有犹太人;马可·波罗说,13世纪的汗八里(即北京)有犹太人。讲到十四世纪中国有犹太人的有:马黎诺里说在汗八里有犹太人;安德鲁·佩鲁贾说,(大概)刺桐(Zaitun)(即泉州)有犹太人;伊本·拔都他说,坎萨(即杭州)有犹太人;中国著作《元史》和《元典章》至少有两处也提到过。最后,17世纪伊斯兰教的著作中也有记载。关于杭州侨民,中文书籍没有记载。19世纪末,杭州清真寺内年迈的毛拉坚持说,他的祖先是来自犹太人的,这可能意味着他是开封犹太教的叛教者,但这并不能证明他就是杭州犹太人的最后残存者。贫穷潦倒的开封犹太人,在1851年开始拆毁他们的礼拜堂。丁甦良1866年2月17日访问他们时,这个礼拜堂似乎已荡然无存,虽然这个侨居地的最后一批残存者据说对他们自己的种族和信仰还有所记忆。以后,即1912年,这个礼拜堂的地基被加拿大圣公会买去<sup>①</sup>。

“当时利玛窦问艾,是否晓得基督教徒,他对此名称一无所知。不过当利玛窦对艾作了一个祈祷手势时,艾说,在开

封、临清和山西也有些外国人，他们随同祖先来到中国，崇拜十字架。他们诵读的那段经文来自犹太人也诵读的犹太经书，可能是圣经中的《圣咏》部分。艾又说，这些人听当地萨拉森人说中国人要杀害他们，在恐惧之下，他们离开自己的礼拜堂（他讲出过这所礼拜堂的名字，这所礼拜堂早已成为菩萨庙）隐匿起来，其中有些人加入了犹太教，另一些人加入了伊斯兰教，大部分人加入了中国人的教派，即崇拜偶像。

“当问及为什么这些人崇拜十字架时，艾无话可答。他说甚至那些崇拜十字架的人也不知所以，只知在吃喝东西时须划十字。神甫们也从别人听说过这样的事，从而知道在中国许多地方确实存在一种风俗，即在孩子前额作一黑十字以防灾祸；他们也知道我国的杰罗姆·拉塞利在其《托勒米地理学注释》（Notes on Ptolemy's Geography）<sup>②</sup> 对中国地图的说法是真实的。

“虽然这种宗教已经消失，但这个犹太人说，仍有许多人保持着划十字的习惯，而且人们从像貌上看出他们与众不同。艾写出了河南所有犹太人后裔家庭的姓氏。这里的犹太人家很多，其中一家姓张的在南京任户部尚书，据说他一直是神甫和官员们的至友。在基督教兴盛时，他们都是极有影响、并有军事才能的人，因此人们对他们存有怀疑。他们的面貌极不同于中国人，所以和犹太人和萨拉森人一样，也被称为‘回回’，只是基督教徒的后裔被称为‘十字回回，意为信仰十字的萨拉森人’。

“萨拉森人的宗教包含犹太教、基督教和异教的成分，所以艾称萨拉森为‘三教’，意为‘信仰三种宗教的人’。艾说犹

太人都这样称呼他们。我们后来知道，中国人对这‘三教’有不同叫法。他们称萨拉森人为‘不吃猪肉的人’，称犹太人为‘不吃筋的人’（他们至今仍遵故习，吃肉时抽去筋），而把基督教徒的后裔称为‘不吃奇蹄动物的人’，因为摩尔人、犹太人和所有中国人皆吃马、骡及其他驮兽的肉，而基督教徒的后裔则保持故土的食物习惯……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大为兴奋，设想这些基督教徒的后裔很容易被引回到他们祖先的信仰上来。”<sup>③</sup>

(1) 米尔恩：《中国的实际生活》(Real Life in China)1858年第336—342页；《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06年第1—20页，1913年第195页。怀特主教在开封居住过，并仔细研究过开封犹太人历史，他对上面几页加了注释和校正。

(2) 杰罗姆·拉塞利译：《克洛迪·托勒米·亚历山大的地理学，新近从希腊文译为意大利文》(La Geografia di Claudio Tolomeo Alessandrino, nuovamente tradotta di Greco in Italiano)，威尼斯版。该书最后一卷第353页。《亚洲，占十一图》第4页注：“秦尼国(SINI)现称大秦，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王国……其民拜偶像，但又称，非常敬拜十字，理由尚未弄清，也许是上帝保护这一圣教的信仰不灭，以便在上帝圣意认为适宜之时，让其生长发展。”此外，拉塞利在《印度，新二十八图》论及秦尼国时说：其国人衣着习俗很文明，但非基督教徒。

(3) 《利玛窦神甫史编》第1卷《中国札记》第469—471页。

大约三年以后，利玛窦派一中国天主教徒去开封调查拜十字架者的情况，但未成功。1608年3月8日，利玛窦在北



京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派一教友去河南省，我们早已听说那里有信仰十字架的遗风，该教存在中国为时已久。但他却未能发现我们想要了解的任何东西，如他们供的是什么神像，使用什么文字。原因是六十年前，中国人试图逮捕有这种信仰的人，因此他们隐瞒了自己的信仰；由于恐惧，他们改信异教或装作摩尔人，迄今还未露其真相<sup>①</sup>。因此，我们这位教友询问这些问题时，他们极为惊慌，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来调查他们。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必要派些神甫去那里，经过长期居住，或可一点一滴地了解其真相。

- ① 大概是在这个时期，外国商人侵犯中国沿海，据说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和怀疑。参看，帕克尔：《中国与宗教》(China and Religion)第 190 页。

“这位教友受到那里犹太人的热情接待。人们不知这些犹太人有任何别的名称，只知道他们不吃筋，故得名挑筋教。他们仍然遵守故俗，因为雅各发现他和天使搏斗后筋受了伤。他们人数不多，但有一所很好的礼拜堂，其中十分尊重地保存着仿古书形式卷起的希伯来文《旧约全书》首五卷（《摩西五经》）。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有其他经书。汗八里距开封仅十日路程，因此只要我们愿意，去那里很容易。”<sup>①</sup>

- ① 《利玛窦神甫史编》第 2 卷第 344 页。

1605 年 7 月 26 日，即大约在艾来访后一个月，利玛窦写过一封信，为上述正式记载增加了一些细节。他说：“几天以前我们才确知，过去五百年间，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基督教徒，

现在许多地方依然留有他们的不少痕迹。近几年中，我已写过，我们在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上发现一个基督教徒团体，但是由于缺乏斯卡提(Scuti, 币名)，不能到达那里，所以至今我们还未派人去了解他们的人数和来源。现在我们知道，在中国中部河南省会开封——从汴八里或南京到开封皆半月路程——有五、六家基督教徒，现在他们几乎已无基督教的任何气味。前数年，他们已把礼拜堂改为关帝庙。至今一直阻碍我们找到他们的原因是，他们不称为基督教徒，而是按其种族称为达娑(即迭屑——译者注)，这好象是他们本国的国名；他们的宗教被称为十字教，即中文中的“十”字，此字完全象基督教的“十”字架。他们的面貌象摩尔人和犹太人，也象他们一样不拜菩萨，所不同之处是，他们吃猪肉和其他种肉时，在其上用 手划十字。

“我们是从一个按信仰、种族和相貌都是地道犹太人那里获悉这些情况的。他有一天来访我，因为他对所听之事颇感兴趣，对记述我们工作的书目中的一本甚为注意；他从此书了解到我们既非摩尔人，又非异教徒，因而以为我们和他同属一教。此人姓艾，河南省人，家住省会开封，其父有三子，他本人致力学习中文，是举人及第，现年六十，来此要求恢复他在扬州学校的原职。另两个兄弟学习希伯来文，好象是教士，因为他说他家乡有一所他们花费一万斯卡提建起的大礼拜堂，那里面有七、八家人属他的宗教。

“他在圣约翰浸礼节后第八天来访。我们在圣坛上挂一大张画像，圣母居其中，一边是圣子耶稣，另一边是圣约翰。他不知道犹太人这个名称，只称自己为上帝的选民。他看见画

中人物以为是雅各和以扫，便说道：‘我虽然不拜偶像，但我想对我的祖先们表示敬意，便鞠躬敬拜。起先他说，他的宗教的创始人有十二个儿子，我想他是一个基督教徒，所谈的是十二使徒，但最后我发现他不是基督教徒，却并不厌恶基督教。他告诉我，他们在中国无法遵守自己的律法，因为割礼、洁身礼、不吃猪肉以及其他种种习俗阻碍他们与中国人交往，而对某些想做官为宦的人更为不利。他给我讲了《旧约全书》上的许多故事，讲述从摩西直到哈曼和马道丘斯（他称之为阿马安和马道卡伊）的十二个部落之事，但他说他已被逐出教门，因此所知不多。他说他兄弟知道圣经上所有的事；他想他们还有其他经书。

“他说他们中间有这样的传说：大约八百年前，帖木儿国王征服波斯时，也征服了中国，大批摩尔人、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同他一起来到中国，其中摩尔人是最强大的，因此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留下来的很少。在河南省，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信徒都有，虽说基督教徒实际上已消失了。但是他们中间有不少学者和高官。有一位南京尚书还活着，名叫张孟男，我在那里时我们是好朋友。去年他来北京时看过我，对我很友好。他对待南京的神甫们也很好。他说这些人不愿承认自己是外国人的后裔，因为这种人在中国不受尊重。从容貌上看，张孟男象我们国的人。

“第二天，艾带来他的一个同乡，姓张，说是基督教徒的后裔，他一定要作官，而且已在长城外距离早先基督教徒居住地相去不远的山西得到一职位，根据这一新官职，那里的人都归他管辖。我们同这人成了好朋友。他很想了解我们的宗教，

并想回到他祖先的宗教上来。六天后，他离开了北京。他一直很忙，此外，还有多妻带来的麻烦。他就这样离开了，此事放在另一时间再谈。他答应我无论在家在职，都将尽力去发现那里还留有多少基督教习俗，去发现我更想了解的事，如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文字，是叙利亚文或者可能性更大的希腊文。我所以倾向于认为他们使用的是希腊文，因为我想起了十年前我从一中国人看到的一个铃。这个铃来历很古，好象是从河南带来的，其上刻有“十”字和希腊文字母。我们正在等待巡察使神甫，他一定会去访问这些人，我也相信，他会立即派人去了解那个地区有多大用处。祈求上帝希望凭借这次调查，能使中国基督教的门开得更大。

“由此我们知道，中国毫无疑问就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他说契丹有基督教徒，这话是确实的，因为在他的时代，中国一定有许多基督教徒。”<sup>①</sup>

① 《利玛窦神甫史编》第2卷第289—293页。关王或关帝是一位人所共知的、被神化了的英雄，大概就是利玛窦所说的关公。在怀特主教给我看开封地图上，就有一座关帝庙在西门附近。《开封府志》（1695年编）未著录此庙，这个事实说明，或者此庙的建立不早于1695年，或者认为这不很重要，也许被人们当作外国寺院。十字在《利玛窦神甫史编》中写作 xezu，艾写作 Ngai，尚书写作 Scianciu，张写作 Cian，张孟男写作 Ciammennan。利玛窦说，张孟男是中牟人，在开封城西数里之处，1565年考中进士。值得提到的是据史书记载，他是万历年间恩赐南京户部尚书官职的二人之一。参看，《明史》，中华书局版（下同）第19册第5825页。特沙（Terza）即达娑（Tarza），是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徒和其他非伊斯兰教徒的称呼，并非真正是民族名，但中国人

对基督教徒（也里可温）和回回（伊斯兰）的称谓则皆符合民族名。

怀特主教告诉我，“七姓八家”是对犹太人团体的传统称谓。

帖木儿大概是成吉思之误。龙华民在1610年11月23日重复说，这些基督教徒是在蒙古时代进入中国的，他把这个时期更加准确地定在他的时代之前三百年。

杰罗姆·沙勿略，根据“一个六十岁的伊斯兰商人的说法〔他说他“在那个王国的汗八里(Xambalù)(即我们所称的 Cambalù),在国王朝廷住了十三年”〕,在1598年7月26日的一封信中,记述了包括皇帝(“那个商人说,他常常看见国王去教堂,因为他是一位基督教徒”)在内的许多基督教徒以及许多教堂和寺院,这些记述显然是错误的,这里无须赘述。参看,《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 of Bengal)第23卷第1期第59—61页;J.沙勿略的另一封信,载奥卡扎尔:《耶稣会编年史……》(Chrono-historia de la Compania de Jesus, etc.),1710年版第209b页。信中说:有一位年高德劭的摩尔人在卡塔约(即契丹。——译者注)居住十三年,直到那里有了许多基督教徒;我在其他地方也听到过这件事。

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龙华民十分相信,那些拜十字架的,是在蒙古人征服过程中来中国的,或者还在此前一百年来中国的,这也许是真实的。但金尼阁在其印度友人影响下,却认为中国基督教的开山鼻祖是圣多默本人。他说:“从马拉巴海岸教堂的叙利亚文手稿中,我们清楚知道,这种信仰是由同一个基督使徒传到秦尼国的,并在那个王国建立好几所教堂。”接着他提供了约翰·马利亚·坎波利从被称为《加扎》(Gaza)的马拉巴圣多默教堂叙利亚文《圣务日课》中译出的两段拉丁

译文,据他说,这是为了使“象这样重要的古代记载能得以保存下来”<sup>①</sup>。伯吉特教授在一本与马拉巴教堂无关的叙利亚文《圣务日课》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两段话,感谢他给我们提供了下面的译文,第一段是:

“由于圣多默,印度人摒弃了崇拜偶像的错误;  
由于圣多默,中国人同埃塞俄比亚人已转向真理。  
由于圣多默,人生真谛之光照亮了整个印度;  
由于圣多默,天国在中国飘然升起。”<sup>②</sup>

第二段是:“印度人、中国人、波斯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爱奥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在此纪念圣多默之际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sup>③</sup>

从《圣务日课》摘出的这两段材料并未说圣多默到过中国,更未说他在那里建立了教堂。金尼阁也许在印度听到了更加详细的情节。沙勿略 1546 年 5 月 10 日写于安波伊纳的一封信中说:“许多人说使徒圣多默到过中国,他使许多人信了基督教。在葡萄牙人入主印度之前,希腊教会派了数位主教去为受圣多默及其门徒引导信了基督教的人们讲道和举行洗礼。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有一主教说,他从他本国来印度之后听驻印度的主教们说,圣多默到了中国并发展了基督教徒。”<sup>④</sup> 1556 年来中国的一个多米尼加人加斯帕·达·克鲁兹写道:“使徒圣多默殉难的地方,葡萄牙人称为圣多默(Sam Thome),当地人称之为莫莱波尔(即迈拉普尔),我在那里时听说,一个忠实正直的亚美尼亚人,为了表示对这位使徒的忠诚,从亚美尼亚来这里朝圣,他发誓宣称(誓词确实无疑,是一个葡萄牙人即多默教堂的管事给他的),亚美尼亚人的一些真

实可靠的书籍中记载说，使徒多默在莫莱波尔殉难之前曾去中国宣讲福音，一些日子之后，他看到工作不能取得成果，便回到莫莱波尔，临行时他在中国留下了他所培养的三、四个门徒。这与这个教堂的典籍相一致。多默留下的几个门徒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有无成果，这个国家是否由于他们而知道了只有一个上帝，这些我们不得而知。但一般说来，他们不知道福音书中的律法，也不知道基督教，也根本不知道一个上帝之说。他们以为，创造、保存和支配世界万物的是上天。他们尤其不知道谁是万物的创造者，而把万物的存在归之于天。他们就是这样盲目感知上帝的。在坎陶（即广州）城内宽阔清澈的珠江中心有一小岛，岛上有一所牧师寺院，我看见寺院内有一所高高耸立的礼拜堂，庭园建设得很好，礼拜堂前有些刻有镀金花纹的台阶，礼拜堂内有一制做精美的妇女塑像，一小孩搂着她的颈项，面前有一盏燃着的灯。我猜测这可能是基督教的习俗，便问那里的一些俗人和僧人，这个妇女表示什么？谁也无话可答，也谈不出什么理由。这很可能是圣多默留下的早期基督教徒制做的圣母像，也许是在他们的时节制做的，也许是某些异教徒们供奉的神像，但起因人们都忘了。”<sup>⑤</sup>

① 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第 124, 125 页。

② 拜占编：《迦勒底圣务日课》(Breviarium Chaldaicum)，共三卷，巴黎 1886 年版，1887 年版；第 3 卷第 476 页。

这是一首二十个对句赞美诗中的第 3、4、8 和 9 对句。

③ 同上，第 478 页。

这些有关中国的史料存在于与马拉巴教堂无关的叙利亚文圣务日课中、存在于据说是早期形式的赞美诗中，这有重大意义，据此可以把有关圣多默向中国人传教的传说至少追溯到 16

世纪末以前。这些史料到那时还未经触动，这个事实就是耶稣会修订者们具有保守精神的证明。景教教规、或称圣务日课，曾被天主教的伊叔-雅布三世（公元 647—657 年）和哈南宁恕修改过〔参看，布哲：《教堂司事书》(Book of Governors)第 1 卷第 79 页，第 2 卷第 176 页；阿赛曼尼的文章，载《东方志》第 3 卷第 1 部分第 145 页，第 2 部分第 518 页〕，而有关中国的记载，是基督教确实传入中国时、或者稍后时期增加的，这是可能的。有关中国的记载是耶茨引自阿赛曼尼著作，见耶茨著《印度教会史》(Indian Church History)1818 年版第 79 页。

- ④ 《J. 沙勿略档案》(Monumenta Xaveriana)〔载《耶稣会历史档案》(Mon. Hist. Soc. Iesu)〕第 1 卷第 407、414 页（书信 56 附言）。
- ⑤ 《中国文集》(Tractado de China)，埃武腊 1569 年版第 kiii 页。参看，《普卡斯朝圣》(Purchas his Pilgrimes)(第 3 卷第 195 页)和《强大中国史》(The Historie of great and mightie Kingdome of China)（帕克译自西班牙文）（1588 年第 24—26 页）。《强大中国史》的西班牙文原著的作者是约翰·贡札勒斯·达·门多萨，此书出版于 1585 年，其主要根据是加斯帕·帕·达·克鲁兹的著作。

何大化讲过一个更为详细的传说，但其情节和上文很不相同。他说：“多默从耶路撒冷出发，一路上向帕提亚人、米堤亚人和波斯人讲经传道，经过阿拉伯，然后乘船去印度。经过长时间航行，在索科特拉岛登陆，该岛是距阿拉伯的费利克斯最近的陆地〔然而也有人说他是在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巴科拉（即今巴士拉）上船的<sup>①</sup>〕。他沿着波斯海航行，经过长时间颠簸，来到两海海口之间的一个岛上；这两个海的水皆通过红海



海峡流出。他在岛上开始播种上帝之道的**美好种子**，种子扎下了深根，结果那里所有的人皈依耶稣基督，并建立了教堂，其中有几所迄今仍然完好存在。这个岛虽被卡塞姆国王侵占，但由于摩尔人与土耳其人进行着大规模贸易，所以该岛仍处在摩尔人控制之下，由于这同一原因，基督教也从岛上被排除，然迄今居民仍然保持着基督教的姓名，崇拜十字架，遵守某些斋戒，并去教堂祷告……

“圣多默从索科特拉岛向印度航行，到达的第一个地方是克兰加诺，这是一个颇为繁华的小城，当时很出名。城内住着马拉巴的国王，当时他正在为一个儿子庆祝婚礼……”

“这个光荣的使徒，据说在克兰加诺传播了基督教后，漫游了马拉巴的整个海岸，最后在库劳(Coulao)（即奎隆）停下来。因为这是一个著名的首府，在这里他使几个人信了基督教。他从那里继续前进，来到马莱波尔城。这是一个特大城市，也是当时全印度最富有的城市。此城现由葡萄牙人居住，为纪念在此殉教的这位圣徒，现命名为圣多默城。圣多默在那里开展传道工作，获得极大成功。他宣讲福音，使国王和臣民皆皈依基督教。他在那里留下几位门徒，使人民继续保持他们所接受的信仰。他从那里搭中国船向中国航行（那时中国犹似海洋霸主，中国人航行于印度洋各海域），最后在叫做汗八里(Camballe)的小城登陆，此城现已不为我们所知。他使那里相当大一部分人信了基督教，他们接受了洗礼，建立了教堂。”

“史书上虽然记载说，圣多默到了中国，或者说到达彼岸，但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他的行程。我们不知道中国人迎接这位